

伊朗大选缘何引发政治危机

□ 王林聪 / 文

伊朗伊斯兰政权创立伊始，具有现代政治理念的三权分立的治理方式就被嫁接到法基赫主宰的伊斯兰政权体系上，选举制度被纳入伊朗的政治系统中，并为伊斯兰政权的合法性提供依据，由此而形成的“伊斯兰民主”，在中东地区可谓独树一帜。因此，选举乃是伊朗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然而，作为选举，最为重要的是它的公正性和有效性，否则，选举结果就很难被选民所认可，甚至会引发激烈冲突。2009年6月举行的伊朗第十届总统大选，围绕着是否存在选举舞弊问题，最终爆发了大规模抗议性示威并演化为深刻的政治危机，不仅对伊朗政局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而且对未来伊朗政治发展道路也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大选搅动伊朗政局，引发危机

按照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宪法，“国家事务必须依靠全民投票来管理，通过选举，选出总统、国民议会议员、各委员会成员等”（第6条）。自伊斯兰革命以来，伊朗的选举活动呈现着“定期、公开、竞争性”等特点。选举涵盖了专家会议、总统职位、伊斯兰议会、地方委员会。其中总统选举首次于1980年举行。从1981年开始，总统选举每4年举行一次，未曾间断。伊朗总统选举通常在数名候选人之间展开争夺，且由公民直接投票选举产生，这为大选增添了诸多悬念，也使得大选更具有竞争性。与此同时，在伊朗各类选举中，宪法监护委员会发挥着特殊作用——负责监督专家会议选举、总统选举、伊斯兰议会选举和公民投票，有权批准议员资格，有权解释宪法。宪监会握有

审查候选人的资格、处理选举中违规问题等大权。一些著名的改革派人士、妇女的参选资格常因各种原因而被宪监会所否决。正因为如此，宪监会又备受非议。

2009年6月的伊朗总统竞选异常激烈，充满了悬念和竞争性。竞选是在现任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前总理穆萨维、前议长卡鲁比和前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雷扎伊之间展开。在竞选阶段，除了分发传单、张贴海报，举行大型集会之外，候选人还首次采用电视辩论方式，在全国观众面前展开一番唇枪舌剑的较量和对垒，抨击对手，阐述各自的施政方略。候选人还调动一切可以利用的政治资源，争夺在竞选中的优势。穆萨维以穆斯林崇尚的绿色作为竞选标识，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绿色浪潮”。他甚至发动其夫人、伊朗知名政治家——扎赫拉·拉赫纳瓦德进行助选，为伊朗总统竞选史上首开先河之举。此前种种推测显示，以保守强硬而著称的艾哈迈迪—内贾德与作为改革派代表的穆萨维之间的实力相差不大，这为谁将胜选增添了悬念。

值得注意的是，大选投票之前，最高领袖阿亚图拉赛义德·阿里·哈梅内伊号召选民积极投票，从而极大地调动了选民的参选热情。6月12日举行大选投票。次日，伊朗内政部长萨迪克·马赫苏利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共有3910万名选民参加投票，投票率高达85%。在4位竞选中，内贾德获得62.63%的选票，穆萨维获得33.75%的选票，雷扎伊和卡鲁比的得票率分别为1.73%和0.85%。结果，现任总统内贾德以绝对优势成功连任。此前呼声很高的穆萨维对计票结果表示质疑，不承认自己

落败，并公开指责选举过程存在舞弊现象。卡鲁比和雷扎伊也纷纷表示选举存在诸多违规之处。与此同时，穆萨维的支持者纷纷走上街头举行抗议性示威，频频与维持秩序的治安警察发生冲突，酿成多人死伤的流血事件。抗议活动迅速波及全国并不断升级。鉴于此，宪监会受命调查。6月29日宪监会宣布，通过随机抽取10%投票箱重新计票后未发现违规现象，因而认定此前公布选举结果有效。在此期间，宗教领袖哈梅内伊多次发表讲话，要求抗议者立即结束示威活动，要求败选者着眼大局，承认现实，维护伊朗的稳定。然而，穆萨维、卡鲁比等人拒绝承认当局公布的选举结果。改革派的支持者的抗议活动并未停止。此后不久，伊朗重要的宗教团体——库姆研究者和教师协会发表声明，批评领导层未充分调查有关选举作弊的指控、使用武力镇压抗议选举结果的示威活动，并对宪监会的裁决表示疑问。接着，前总统哈塔米提出，为解决目前的危机，应该对内贾德当选的合法性进行全民公决。至此，因对选举公正性的质疑而形成对峙状态最终演化成一场空前的政治危机。

大选引发危机诸原因分析

矛盾的爆发通常是在一定时空条件下借助某种途径而引发的。此次伊朗政治危机是伊朗社会内部多种矛盾以大选争端为突破口所致。表面上看，这场危机肇因于以穆萨维、卡鲁比等改革派对选举的公正性的质疑，改革派支持者对选举结果的不满并举行大规模的街头抗议活动，政坛多名重量级人物，诸如担任专家会议主席和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主席的前总统拉夫桑贾尼、担任专家会议成员的前总统哈塔米对穆萨维的支持，从而使伊朗国内政治和宗教精英集团的内部分歧因选举争端而公开化，触发了一场空前的政治危机。

然而，从深层原因看，大选危机背后所暴露的问题是伊朗伊斯兰政权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现政权一方面固守法基赫（什叶派教法学家，这里指宗教领袖）的统治，另一方面又允许民众的政治参与，两者之间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同时，在“克里斯玛式”人物霍梅尼去世后，宗教领袖的神圣性和权威性呈减弱趋势，加上握有实权的宗教精英阶层逐渐腐化导致其“清誉”剥落，从而大大降低了普通民众对现政权的效忠程度。在当前伊朗经济形势陷于困境的背景下，许多民众寄希望通过大选改变现状，进而采取抗议、示威等方式来表达这种诉求。可以从以下几方

面揭示大选所引发的危机。

首先，对于当权者而言，选举是一次权力的再分配过程，是伊朗政坛走向的晴雨表。选举的结果反映了法基赫主宰下保守派与改革派实力对比和权力分配格局。在伊朗，政坛派别斗争由来已久。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后不久，政坛上出现了观点相左的政治派别，但在宗教领袖霍梅尼的干预下，持不同观点的派别和人士未形成对峙局面。1988年“德黑兰战斗宗教人士协会”从“德黑兰战斗宗教界协会”分离，形成左、右两大对立阵营。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伊朗经济的发展，右派阵营又发生分裂，形成以拉夫桑贾尼为首的务实派和以哈梅内伊为首的保守派。1996年伊朗议会选举前夕，务实派与左派结盟，并在1997年5月总统大选期间组成松散的改革派联盟，联合推举改革派候选人哈塔米，出现了改革派联盟与保守派对峙的局面。在保守派与改革派的对峙中，前者一直占据绝对优势，掌控实权，但双方的较量仍有反复。其中，2000年至2004年可谓改革派的黄金时期，被誉为“第二共和时期”。不仅总统职位由哈塔米竞得，而且在首届地方选举（1999年）和第六届议会选举（2000年）中改革派议员均占有优势，其中第六届议会选举改革派获得189席，保守派仅获54席。即使在保守派夺回伊斯兰议会（第七、八届）绝对多数席位、内贾德2005年当选总统之后，改革派还在2006年12月第四届“专家会议”和第三届地方议会中取得了优势。在第三届地方议会选举中，内贾德总统领导的强硬保守派候选人遭惨败，所获席位不到总数的20%。然而，改革派在2008年议会选举中惨败（仅获得47席）之后，已处于一种边缘化趋势。于是，改革派将目标锁定在2009年总统大选，试图力挽颓势。因此，本次总统大选就成为双方争夺的一个关键。

其实，伊朗各政治派别之间对立就其本质而言仍属于政权内部的策略分歧，即在伊斯兰政权框架下选择何种施政治国方略。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派不是伊朗伊斯兰政权的反对派。但是，伴随着每一次选举过程，保守派与改革派两大阵营之间的鸿沟不断加深，矛盾尤为尖锐。两派之间的分歧便由半公开逐渐公开化，且呈现难以调和的态势。于是，这种内部矛盾、分歧的激化必然反映在社会层面上，与伊朗深刻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相交汇，形成了巨大的社会张力，酿成严重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

其次，对于普通民众而言，选举是实现政治参与的重要途径，又是现政权合法性的基础。公民政治参与包括了

选举、投票、结社等多种形式。在伊朗，政治参与有助于扩大民主，使公民有机会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利，也为伊斯兰政权的合法性提供了依据。前总统哈塔米曾说：“选举是体现民众意愿的最佳准则。在伊斯兰共和国制度中，即使是领袖也是由人民通过专家会议选举产生的，因为专家会议成员是经民众选举而当选。因此，选举展现着政权的合法性及其声望。”^①可以说，政治参与状况反映民众对于政权合法性的认可程度。其中，投票率常被视为衡量政治参与状况的尺度。首届伊朗总统大选的投票率为71%。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投票率持续走低，徘徊在52%—55%之间。90年代后期，人心思变，民众对主张改革的代表哈塔米寄予厚望，政治参与的积极性迅速上升，并形成了高投票率和高得票率的“双高”特点：1997年和2001年大选的投票率高达79.85%和70.26%，哈塔米当选总统的得票率分别为69%和76.9%。^②此后，投票率持续走低。第七届伊斯兰议会选举投票率为50.57%，其中德黑兰区仅为30%。此次总统大选，统治阶层为了展现伊斯兰民主的独特魅力，鼓励人们政治参与，以期改变“政治冷淡”现象。于是，在宗教领袖的呼吁下，民众积极参与投票，以表达自己的政治选择倾向，许多人把投票作为改变现状的一种途径。从而将投票率推高至85%。显然，这种自上而下的动员式政治参与潜伏着一定的风险。当选举结果出乎许多民众的期望，即内贾德的连任被许多人视为是改变现状愿望破灭时，由此而产生了强烈挫折感和不满情绪。实际上，民生问题长期困扰着伊朗。内贾德执政以来，正值石油价格飙升时期，但滚滚石油财富没能缓解伊朗经济困境，相反，高物价、高通胀和高失业率愈演愈烈，又逢当前油价走低、全球金融危机加深，伊朗民众处境更加艰难，贫富差距急剧扩大，中产阶级的数量正在减少。加上腐败日益严重，各种社会问题丛生。凡此种种，激起了许多民众的强烈不满，最终借大选问题而以示威、游行等方式表达出来。尽管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已多次要求终止危及伊朗稳定的抗议性示威，但是，抗议活动并未平息，足以看出伊朗社会深层问题的尖锐性和复杂性。

再次，保守派与改革派在大选中的较量掺杂着诸多复杂的变数，激化了双方之间的矛盾。大选前夕，哈梅内伊含蓄却也清晰地透出对内贾德的支持信息，影响着总统竞选的这架“天秤”。在选举结束后1个小时后，内政部就宣布了初步统计结果。正式选举结果又在不到1天的时间内公布，按照以往惯例选举结果是在3天后宣布。在经济

衰退、通货膨胀加剧、失业率攀升、抗议政府经济政策之声不绝于耳的情况下，内贾德所获选票之高，出乎改革派的预料。更令改革派难以置信的是，在伊朗西北部城市——穆萨维的家乡大不里士，内贾德竟然轻松获胜。被改革派看作是穆萨维得票领地的许多城市也相继失利。与此同时，哈梅内伊第一时间向内贾德当选表示祝贺，随后又要求宪监会调查计票情况，这一微妙变化使得最高领袖的权威受到一定影响。而改革派对宪监会（由12人组成，其中6人是宗教领袖任命的神职人员，6人是司法总监向议会推荐并由议会投票通过的普通教法学家）的公正性历来持怀疑态度。此外，一些西方媒体借故鼓动伊朗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试图推动伊朗上演“颜色革命”，这为伊朗政治危机的复杂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大选危机”对伊朗政治发展的影响

2009年6月出现的“大选危机”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合法性危机的一种初现。如前所述，在伊朗伊斯兰政权框架下，宗教领袖的权威性和神圣性是毋庸置疑的。宗教领袖代表真主的旨意，总揽国家权力，统帅全国武装力量，任免司法首脑，签署当选总统任职书并有权罢免总统，有权决定举行公民投票、宣战、停战和大赦，协调和裁定立法、行政、司法三权机构的分歧，等等。可以说，宗教领袖在伊朗的地位是至高无上、一言九鼎。但是，围绕此次大选争端，最高政治领袖在一些场合的调解和呼吁没有达到预期效果。许多改革派人士及其支持者仍不愿承认败选的现实，造成政治危机难以缓解，也使得法基赫主宰的权威性受到了挑战。正因为如此，此次总统大选所引发的动荡，乃是伊斯兰革命以来最为严重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凸显了伊斯兰政权内在的问题和矛盾。鉴于此，“大选危机”堪称伊朗政治变化的分水岭。

但是，另一方面，伊斯兰政权的统治根基并未受到损害，法基赫仍牢牢把握国家大权，控制着社会。在伊朗，教士阶层和军情系统是支撑伊斯兰政权的基本力量，清真寺乃是维护其统治的一个个据点。每个清真寺相当于一个街道委员会，形成有效的社会控制和社会动员的网络，服务于伊斯兰政权。法基赫主宰的这一格局短期内不会改变。同时，伊朗政坛的改革派不是伊斯兰政权的反对派力量，改革派就其实质而言是寻求在既定政权框架下实现权力的重新分配。现阶段这一目的尚难达到，保守派牢牢掌控实权，控制司法、宪监会、革命卫队、广播电台等机构。改

革派与保守派之间的较量将是长期的、复杂的和尖锐的，双方矛盾的激化在一定条件下可能会转化为社会阶层之间的斗争。但是，从目前内、外部条件看，伊朗不存在西方媒体所期望的“颜色革命”。

透过此次伊朗总统大选，可以有如下启示：

1、选举与政权合法性问题。选举既可以为政权的合法性提供依据，又可能因选举的公正性问题而削弱其合法性。由此表明，只有当选举是公正的和自由的，才是有效的，并为民众所认可。于是，加强对选举环节的监督，使选举公正、自由、透明是最为重要的。

2、选举与政治稳定的关系。在世界民主化进程中，因选举而引发社会、政治危机的事例比比皆是，特别是对于那些刚刚迈上民主化道路的国家，制度建设尚不成熟，选举的启动可能伴随着巨大的风险，引发社会动荡和政治

失稳，给社会发展带来严重危害。因此，选举应当在保持社会与政治稳定的前提下有序稳步推进。

3、政治参与的适度性问题。政治参与阻塞或政治参与超负荷都容易导致社会成员期望值与社会满足能力之间的落差，进而滋生对社会现实的不满情绪，成为引发政治不稳定的因素。因此，一定的政治参与应同社会发展状况、公民素质相适应。■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社会文化室主任）

（责任编辑：刘娟娟）

① Bahman Baktian, "The Impact of Elections in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Journal of South Asian and Middle Eastern Studies*, No.2, Winter 2002, p. 66.

② John. L. Esposito and R.K. Ramazani, ed., *Iran at the Crossroads*, Palgrave, New York, 2001, p. 53.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2006*, Routledge, 2005, pp. 409; 458.

（上接第10页）

时代的重要国际关系原则。过去对“模式”的理解，偏重于“普世性”，甚至要成为唯我独尊的和强迫别人接受的一种“样板”。而现在普遍理解的是，“模式”“狭义化”了，只是各国自己选择的一种不同于别人的发展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既有“中国模式”，也有“俄罗斯模式”、“印度模式”、“巴西模式”和“南非模式”种种，“中国模式”只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别称，既不是拷贝别国模式，也没有推广到别国的愿望与要求。中国正在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这种探索过程将是漫长而复杂的，因此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北京共识”。各种模式各有长短，可以相互探讨和相互借鉴，而不能自吹自擂，更不能强制推广于世。

多极化格局中的大国战略互动

多极化格局形成大国之间战略相互协调与相互制衡的复杂关系。应运而生的是大国之间的各种所谓的“战略伙伴关系”。适应国际格局多极化的发展，“战略伙伴关系”既非过去的同盟关系，也非昔日的全面对抗，而是大国关系的稳定剂，以维系双边或多边关系的共同“战略利益”。

西方大国美、欧、日之间的关系仍维系着“盟国关系”，但已经不是昔日的欧日唯美国之命是从的“同盟关系”。欧盟总体力量的发展，已经成为多极化格局的重要一极。

在重大国际问题和地区热点问题上，更多地采取一种“调解人”的角色，推动协商谈判和平解决。欧盟主张发挥新兴大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作用。“8+5”模式和 G20 都是欧盟力主推动的。

稳定发展新兴大国同西方大国以及新兴大国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对多极化格局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大国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没有固定模式，没有特定条约或协定的约束性，因而也存在实行过程中的随意性。落实“战略伙伴关系”需要双方从战略高度处理双边关系中的各类问题，既维护自身的战略利益，又要考虑对方的核心利益。“战略伙伴关系”关键在于使之机制化，特别是要建立全方位宽领域的对话与交流机制。

多极化是对国际力量格局和结构的一种现实认识。而多极主义是大国政府对外政策的一种选择。中国、欧盟和俄罗斯以及许多发展中国家都主张多极主义。欧盟对多极化格局的新认识已成为欧盟对外政策调整的出发点。美国曾经以其雄厚的实力主张“单极主义”和“单边主义”。奥巴马政府正在逐步放弃“单边主义”，寻求“多边合作”。但要“听其言、观其行”，美国政府对外政策如何发展，能否适应多极化的现实，还有待于观察。■

（作者系中国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

（责任编辑：肖雪晴）